

江海涌动私营潮

徐兴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江海涌动私营潮

徐兴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摘要	1
1 引言	1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背景	1
1.2 文献综述：对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研究述评	5
1.3 主要理论视角	11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17
2 转型期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演变	22
2.1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概念及其特征	23
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变化	27
2.3 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现状	41
3 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变迁	50
3.1 南通所处区域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现状	50
3.2 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变迁	53
3.3 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生成及演变的机制分析	61

4	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	71
4.1	南通与全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状况的比较分析	71
4.2	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东莞、成都私营企业主阶层比较情况	84
4.3	影响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特征的因素分析	100
5	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趋势与困境	108
5.1	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趋势	108
5.2	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面临的困境	117
6	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变迁的政策建议	135
6.1	理念层面	135
6.2	法律和制度层面	144
6.3	组织机制层面	158
6.4	企业文化层面	166
7	结论和讨论	173
	致 谢	177
	参考文献	178
	附录一：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194
	附录二：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状况调查问卷	195
	附录三：南通市私营企业主状况访谈提纲	199

摘要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私营经济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形态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阶层。南通市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经济开放较早的城市之一，它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演变是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核心内容。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这一独特的阶层？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笔者以南通私营企业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公正理论、市场转型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采用调查研究法（抽样调查），个案研究法，辅以文献研究法，试图剖析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内部结构及其变迁，探寻其演变规律，以此来揭示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变迁的轨迹，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转化而成的，处于中间状态、过渡阶段的社会集团”。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从 1979 年到 1982 年，私营企业主逐渐从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以及个体户等群体中发展出来；从 1983 年到 1988 年，私营企业主逐渐取得合法身份，从边缘甚至体制外群体发展成为体制内的“补充”群体；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因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风波的影响，私营企业主阶层遭至舆论与政策双重压力，从而暂时萎缩；从 1992 年到 2000 年，私营企业主阶层获得稳定发展，从“补充”地位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以后，私营企业主获得迅猛发展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笔者在回顾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历程之后，又从物质财富与经济资本、学历构成与文化资本、社会来源与社会资本、阶层意识与价值观念等四个方面描述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现状。

在南通市所处的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几乎占据全国私营企业的半壁江山，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也占有相当比重。与全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变迁过程一样，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变迁可以分为初步形成、暂时萎缩、稳定发展与迅猛发展等四个阶段。笔者从定量的角度，运用数据分析了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四个时期的变化发展。在此基础上，从资金积累、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分析了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生成及演变机制。

结合全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情况，笔者概括了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抽样调查显示：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以中年男性居多；其文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精英循环是南通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生成机制；南通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较强；其政治参与程度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南通私营企业主大多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处于中层；其社会责任感较强。此外，笔者将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东莞和成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了对比，发现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体经济实力更强、更重视缓和劳资关系、更具有现代经营理念。

当前，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有五大发展趋势：社会贡献更为突出、政治诉求更为强烈、社会影响日趋复杂、社会来源逐渐多元化、阶层成员职业化程度提高。同时，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还面临五大发展困境：私营企业主阶层对“原罪”心有余悸、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较多并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生存与发展压力逐渐增大，企业主难以转变其固有的家族式经营传统，其国际化拓展还存在诸多障碍。

有鉴于此，政府应当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继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力的制度环境：在理念层面，应当在社会公正和社会合作理念的指导下，明确私营企业主作为建设者的社会属性；在法律与制度层面，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和完善以产权保护与产权交易为代表的基本制度，逐步构建以利益共享为准则的劳资关系，推进以现代股份制、职业经理人等内容的制度创新；在组织机制层面，政府要转变角色及行为方式，真正成为服务型的政府。同时，要合理引导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引导其有序进行制度化参与。此外，政府还要倡导核心竞争，并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为私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企业文化方面，需要以企业主道德伦理为依托，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与诚信体系建设，从企业文化上推进私营企业主的阶层结构优化。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 阶层结构 社会转型 社会资本 社会公正 政治参与

自序

写这本书，完全是历史的责任在召唤。

一位哲人曾说过“生命很容易被时间所战胜，但时间却很难抹去生命留下的痕迹”。十年前，当我在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时，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深深地吸引着我。如何探寻其发展运行的轨迹？这个领域的群体和阶层是如何演化和变迁的？带着这些问题，我时常进行观察、研究和思考。十年来，无论在县一级党委、政府岗位上，抑或在市级综合部门工作，我都十分地关注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无论走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抑或是到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我都十分地注意观察与中小企业有关联的人和事；无论在南通与市级机关和部门的同志交流，抑或是赴基层调查研究，深入一线，走村入户，我都时刻关注私营企业主这个群体阶层变迁的点点滴滴。五年前，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我向我的导师，中央党校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吴忠民谈了论文选题的定位，以南通市为例，对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他欣然应允。多年的资料积累、实地考察、研究和写作过程，我深深地感到要面对一个个热点、难点和亮点问题，真正沿着自己设立的目标去努力是多么地艰辛和困难。然而，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我，使我在艰难的笔耕中摸索前行。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历史的长河中，群体、阶层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不同的人结成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成为推动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我的家乡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依黄海，南临长江，位于齐鲁、荆

楚、吴越三大古文化的交汇点。多少年来，在这个民风纯朴、人文荟萃的江海大地上，南北文化的撞击，移民文化的交融，水流文化的浸润，战地文化的洗礼，形成了独树一帜、开发开放、会通包容的江海文化。五方杂处，南北交汇造就了南通人兼容并蓄的气度；江尾海端、崇川福地炼造了南通人善良、聪慧、勤劳、质朴的品格。正是这种独有的气度和品格，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南通人拓荒造田，经商创业，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00 年前，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张謇胸怀“实业报国”的抱负，率先在南通进行工业革命，使南通成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祥地。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社会实践，不仅确立了南通在中国近代私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带动南通在近代实现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惊世崛起”。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产业支撑，而且培养了南通人开拓、开放、开明的良好品质。正是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艰难拼搏，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提供创业平台。怀鸿鹄之志，揽各方人才，以敢为天下先的气度，吸引一批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在南通投资兴业，大显身手。逐步形成和壮大的私营企业家群体和阶层，引领着南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实现南通在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辉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南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格局逐渐被多种经济所有制所取代，个体经营经济从“补充经济”到“主流经济”。尤其是近几年来，南通各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抢抓机遇、真抓实干，私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动力强劲，空间广阔，南通这座千年古城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一批批涌现出来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纷纷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和阶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中开拓进取、顽强拼搏，使南通在江苏成为名符其实的私营经济大市，成为首届中国十大私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与私营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使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南通市整个社会阶层中的比重日益提高，阶层的变迁是整个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变迁的缩影。

万里长江与滔滔黄海的深情交汇，孕育了南通这一方神奇的土地。南通私营

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壮大，尤如江海涌动的大潮，不仅推动着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南通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南通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又推动着私营经济的大跨越、大提升，从而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更加壮大。这种螺旋式的上升不断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向新的更高层次上迈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说，100 年前以张謇为代表的那一代人揽大江入海之雄，立近代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一个辉煌。那么进入新世纪的头十年，780 万江海儿女一定要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包容会通，敢为人先。以更加崭新的风姿，继续弘扬先贤伟业精神，努力跻身创新创业大潮之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再创新佳绩，再铸新辉煌。

徐兴林

2012. 11. 8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背景

1.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以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开始弱化，逐渐形成了以经济社会指标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营企业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它不仅使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而且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建设力量。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中坚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其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如何认识和定位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学术层面对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演变进行研究，最终使其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研究这一课题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有利于弥补当前对这一理论研究的不足。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迅速崛起，队伍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这一系列的社会变化现象，目前在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还找不到现成的理论作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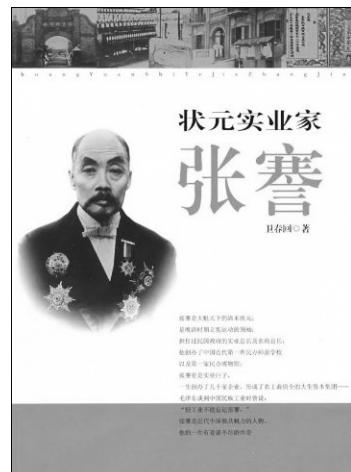
从实践上来讲，研究这一课题可以引导我国私营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壮大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转有哪些作用，私营企

业主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会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研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深入了解它在社会转型期与政府、公众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持社会安全运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1.2 选题的背景

选择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源自于南通市私营企业经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南通市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使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南通市整个社会阶层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选择南通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分析，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南通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与私营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变迁是中国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南通市是近代中国私营企业的发祥地之一。虽然当前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工商业者没有太大的联系，但现今南通私营企业主阶层必然嵌入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当中，其产生和发展受到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早在1895年，清末状元张謇（1853—1926）在中状元“大魁天下”之后，转而兴办实业和教育。他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为抵御外资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开始通过招商集股的方式在南通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大生集团。到1913年，大生就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唯一成功的内资纱厂。他还陆续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天生港轮船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二十多个近代企业，使得“大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集团。以张謇为主要代表的南通民族资产者的实践为南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商业文化基础，这种商业文化包括了很多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如实业救国、棉铁主义、民办官助、教育救国、改



近代实业家张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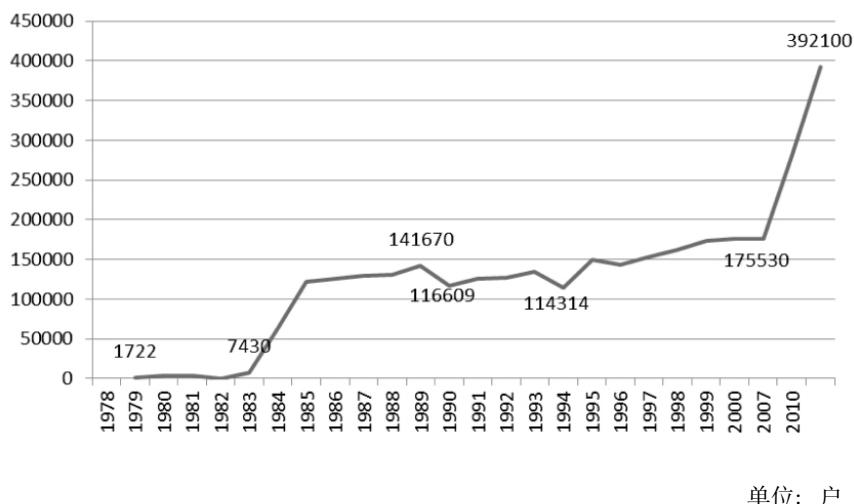
良主义、开放主义、村落主义、慈善公益等几个方面（虞和平，2004）。张謇也被不少经济学家和史学家都认为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南通也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2. 20世纪50年代，南通对私营企业队伍实现全面地“公私合营”，这一措施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解放前的中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南通的工商业日益败落。南通解放后，全市农村小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开始复兴和繁荣。1956年，南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私营企业队伍进行公私合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记载，南通大生公司总经理徐敏礼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6年初，南通的个体私营企业全部纳入“公私合营”和集体经济轨道。



近代第一个股份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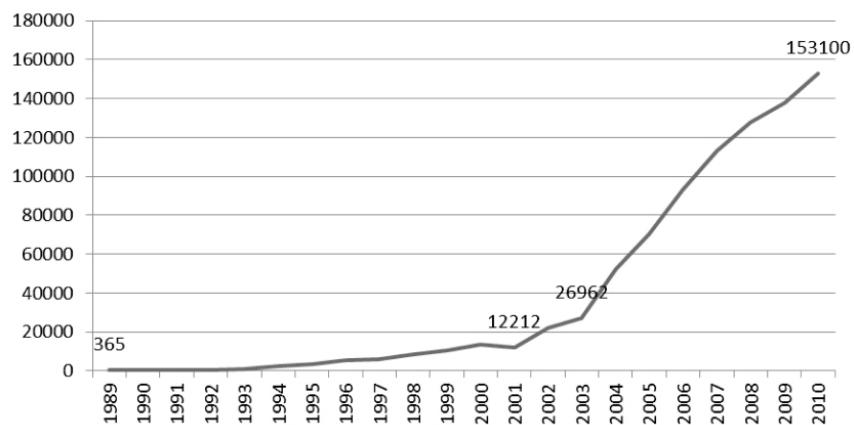
3. 改革开放后，南通的私营经济一波三折终成主流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通市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格局逐步被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所取代，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体制外经济到“补充经济”再到“主流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详见图1.1、图1.2）。到2010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39.21万户，私营企业达到15.31万户，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共计3898.4亿元，位列江苏省第二（徐守铭，2011）。南通市在江苏省成为名副其实的私营经济大市。



单位: 户

图 1.1 1978—2010 年南通市个体工商户户数增长图

数据来源: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2008. 转型与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南通.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23 – 130; 徐守铭, 2011. 南通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2010—2011.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9 – 10.



单位: 户

图 1.2 1989—2010 年南通市私营企业户数增长图

数据来源: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2008. 转型与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南通.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23 – 130; 徐守铭, 2011. 南通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2010—2011.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9 – 10.

南通市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国内理论界和高层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2007年首届中国十大私营经济最佳活力城市评选中，南通位居榜首。2007年《中国城市民营经济活力调研报告》认为南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行之地，其在江苏省率先确立了民营经济是主流经济的地位。可见，选择南通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结构的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其典型性，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借鉴意义。

1.2 文献综述：对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研究述评

就阶层的社会功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的组合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最大的变化，注定会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视野。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定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来源构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行动逻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1.2.1 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定位的研究

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的党代会，尤其是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建设者”定位后，原先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合法性以及内涵的意识形态争论的论题逐渐淡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客观的描述与分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流。私营企业主能否构成一个阶层，该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如何成为研究人员争论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主要形成了如下三种论断：

第一，特殊群体论。特殊群体论认为私营企业主并不单独构成一个阶层，而是目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张宛丽认为，从本质上讲，私营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产资料及剩余劳动，不属于“靠工资及薪金谋生”者，但考虑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资源构成及分配的复杂性、多元性，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私营企业主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均会处于中间状态（大私营企业主除外），因而可视其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张宛丽，2002）。李国庆、黄平亦提出，中国的私

营企业主能否形成独立的社会—政治阶层并成为推进公共秩序建立的主导力量？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李国庆，2004）。

第二，社会集团说。张厚义认为私营企业主是“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转化而成的，处于中间状态、过渡阶段的社会集团”（张厚义、明立志，2000）。李强认为，现阶段我国中间阶层可分为四个社会集团，其中一个就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并认为这个部分的增长速度最快，很可能上升为中间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李强，2005）。海贝勒在1996—1997年对中国私营企业家阶层进行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一书。在书中，海贝勒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与越南的私营企业家进行比较，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定位为——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此类群体的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长期的行动计划和一个相应的行为战略以及成为有影响的社会行为体”（托马斯·海贝勒，2003）。

第三，社会阶层的观点。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私营企业主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具有相对独特的行为方式和特征。陆学艺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少把中国的社会成员分为十大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并因其占有充足的经济资源而把它排在第三位（陆学艺，2002）。北京市社科院的江树革研究员认为，目前，私营经济发展规模在总体上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分化加剧，其政治参与的诉求增加，践行社会责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形成较为一致的阶层评价和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突显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江树革，2008）。

1.2.2 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来源及其构成的研究

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来源于其他社会阶层。因而，对该阶层来源与构成进行研究的也是对目前社会流动机制的审视。

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内部结构方面，李强分析了1992年初以前私营企业主的城乡结构，包括发展水平、人员构成、社会功能三方面。他认为，城市中的私营企业主的权力、声望和教育在城市各阶层的分层体系中属于素质地位和社会地

位较低的群体，而农村中的私营企业主在权力、声望和收入方面则是农村社会分层中素质地位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李强，1993）。贾铤分析了私营企业主的基本状况：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占绝大多数，农村女性更少；从年龄结构看，中年人占绝大多数；从教育结构看，城乡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从社会地位、声望、政治参与程度上看，农村业主高于城镇业主；在城乡对比中还可看出，农村企业起步早，雇工人数多，经营规模大（贾铤、秦少相，1993；贾铤、王凯成，1988）。

在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以及流动机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光金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机制已经从以前的以精英循环为主转向以精英复制为主（主要是从其他类型的精英转变为私营企业主这样的经济精英）（陈光金，2005）。还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仍是精英再生而不是精英循环，这就导致了传统政治资源、政治权力的作用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不会贬值，而是延续下来并长期保持其存在的基础（李路路，2003）。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表明，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机制主要以精英复制为主，即来自于其他社会精英阶层。

此外，一些学者还通过定量研究，利用实证数据来描述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来源及其构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为基础。例如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联合组织的连续性调查，张厚义等主编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黄孟复主编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报告》等。通过大范围地搜集数据，学术界能够相对客观地了解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构成、来源等问题。以全国工商联为主导的中国第八次私营企业抽样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机关干部、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科技人员已经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历次的调查结果表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保育钧，2008）。

1.2.3 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行动逻辑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动力既来自市场力量的扩张，同时又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作为社会转型产物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注定会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行动逻辑。他们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如何面对不确定的外部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类似的问题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第一，从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来探讨行动逻辑。魏昂德 (Andrew Walder) 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解释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得以延续的现象，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观点。他认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工厂内部的结构关系一样，企业的管理者类似于车间主任，政府领导类似于厂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仅参与市场的培育和管理，而且还作为“厂商”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获取经济回报 (Andrew Walder, 1995)。边燕杰和罗根用实证方法提出并验证了“权力维系说”，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单位制度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政治权力所有者可以在市场体制中优先获得实惠，因此其经济回报不会随着市场化转型而减少 (涂肇庆、林益民, 1999)。戴维·古德曼 (Goodman) 通过山西的实证研究说明，私营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 (Goodman David, 1999)。孙立平也提出了私营企业“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他认为在目前的转型时期，非正式层面的权利的不均衡与正式层面的权利低水平的均衡是相互并存的，行政权力在某些方面弱化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强化了。在企业活动缺乏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庇护主义关系结构必然会产生，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 (孙立平, 2004)。

第二，从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逻辑。林南主张从科层协作、市场调节和地方协调来分析改革中的经济体制，其中地方协调的角色至为关键。同时他特别强调以扩大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认为地方协调的建构基础是地方网络或者关系网，主要是家族亲属关系。在地方性市场中，领袖的权威是源自对社区内所有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控制，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国家科层体制的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 (林南、李康, 1996)。折晓叶、陈婴婴认为，乡镇企业产生于社区母体之中，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里的企业”，而更是一种“社区里的企业”，其经济活动深深“嵌入”于社区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即使企业家个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是深嵌于这种关系网络之中。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只有依托这一关系网络，其人力资本才表现出价值，才得以积累、增殖并发挥作用 (折晓叶、陈婴婴, 2004)。边燕杰和丘海雄认为，企